

独立寒秋

孔文中出现过“狗日的”一类下流粗话，且有集体瞻仰少女裸浴之下流场面，足证孔之为人下流粗鄙之极。而如此下流粗鄙之辈竟为北大老师，岂能不误人子弟，教唆出三千流氓八百无赖乎！噫，北大危矣！吾中华民族危矣！——孔庆东自序

北大副教授 + 业余围棋二段 + 专业排球裁判 + 一个大好人 + 文字爱好者 = 一本有趣的书

【叩叩芳心】

校园主路旁有一座雄鹰雕像高耸入云。据说那雄鹰每天俯视着下面来往的学生，它如果看到一个处女，就会马上展翅飞走。可是多少年过去了，雄鹰还屹立在那里。

韩国大学一瞥
仁爱的尹淮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真龙藏不住
特立独行的葵花
板门店的枪声
魂断板门店

【捋捋虎尾】

如果站在街头大喊一声“朴昌范”，肯定会有很多男人答应。如果喊“李万姬”，则会有女人答应，因为韩国男人都很忙，每天都要“日理万机”。

迟到与礼数
知识分子的人情债
在韩国看奥运
韩国的海
传说与国民性
还是叫汉城好
泌园春·客韩

【画画美眉】

韩剧中的女影星大都令人产生“惊艳”之感。哇！韩国女人真让人吐血耶！其实不然。而那些“假欧罗巴”式的美女，用咱们东北话说，是咋“整”出来的呢？告诉你，咋整？拿刀子硬整呗！

那该多好啊
落花岩
喜战李昌镐
刀下出美人
不漂亮的女生
坐飞机上课的学生

韩国大学一瞥

客韩两载，“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大学。迄今为止，我已经去过了韩国的大约40所大学。它们是：

汉城20多所：梨花女子大学，诚信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汉城女子大学，国立汉城大学，市立汉城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央大学，东国大学，建国大学，檀国大学，成均馆大学，圣公会大学，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庆熙大学，弘益大学，西江大学……

釜山的新罗大学，仁济大学，韩国海洋大学。

大田的忠南大学，又松大学。

大邱的岭南大学，庆北大学，庆山大学。

天安的天安外国语大学，檀国大学分校。

还有仁川的加图立大学，光州的朝鲜大学，江陵的江陵大学，安城的中央大学分校，安养的圣洁大学，抱川的大真大学，益山的圆光大学，唐津的新星大学，济洲岛的汉拿大学等。

下面把这大约40所大学分成几类略加介绍。

我所任教的是梨花女子大学，这是韩国人数最多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拥有2万左右女生。它不仅在韩国的女子大学中独占鳌头，在韩国全部大学的排名中，也是稳居前十名，据说曾经名列第四，仅次于汉大、延大、高大这三驾马车。现在虽有很多大学不服之，但排在七八名，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详情可以参看我即将问世的《身在女儿国》一文。除了梨大外，韩国还有许多女子大学。上面提到的另外几所女大，我都有朋友在那里任教。其中诚信女大跟淑明女大竞争二姐的位置。我一次去诚信女大时，那里的教授正在抗议校长。他们把校长的办公用品都给搬出来，在办公楼外面搭了帐篷，吃住在那里，日夜示威。我打听为什么抗议，朋友告诉我说，这位校长是淑明女大的校长的妹妹。教授们认为，凭什么姐姐当淑明的校长，而派妹妹来当诚信的校长，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一定要斗争，决不当老三姐。

按照学校的声誉来排名的话，国立汉城大学的老大地位是举国公认的。但是汉大在亚洲的排名并不突出，有的说排在40多名，有的说排在80多名。汉大原来在市中心的大学路一带，一直是韩国的学术中心和学生运动中心。70年代中期，朴正熙政权为了消解学生运动的威力，故意把汉大迁到汉城最南郊的冠岳山麓。那里至今也不怎么热闹繁华，但一进校园就感觉到气象不凡，有一种王者的平静和舒缓。而大学路虽然缺少了汉大，却依然充满先锋文化气息，到处是咖啡馆、画廊和小剧场，街头公园经常有露天演出和艺术活动，洋溢着浓郁的学院气息和蓬勃的青春激情。我在那一带会见过一些韩国最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只是去过很多次仍然迷路。

中国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汉大以下，谁是二哥呢？延世大学与高丽大学互不服气。于是两校每年举办一度文化体育大竞赛，实际上等于一个盛大的大学节。只是延世大学叫

做延高战，高丽大学叫做高延战。由于延世大学是我们梨花女大的邻居，相隔只有一条马路，仿佛是一个大学专门划出一块女子校区。来往密切，两校无猜，所以梨大的立场一般站在延大一边，我也多数情况下叫延高战。可是今年的延高战的决战，是高大的朋友请我去看的。在奥林匹克主运动场几万人天崩地裂的呐喊声中，我坐在高丽大学的队伍里。所以我只好叫高延战。可惜高丽大学竟然输了。当然胜负并不重要，两校的竞争主要在于加强彼此的交流和自身的凝聚力。当我回到梨大转述说周末去看了高延战时，学生立刻给我纠正，是延高战。我连忙承认错误。我知道，梨大许多学生的男朋友是延大的。我曾经问过学生喜欢延大还是高大。她们说高大的男生比较粗鲁，不如延大的温柔。其实我看还是近水楼台的缘故。如果梨大跟高大是邻居，那学生可能就会说高大的男生有男子汉气质了。高大建立于1905年，有抗日爱国传统，以民族主义为校魂，号称“民族高大”，校徽是一头斑斓猛虎。以前的学生中多数是寒门子弟，能吃苦，讲义气，喜欢喝便宜的传统浊酒，在学生运动中敢于冲锋陷阵。他们在2000年的一次游行示威中，巨大的横幅上写着“造反有理”。不过近年来韩国大学的生源普遍趋向富家子弟，高大的这些特点已经不大明显了。我这次观看高延战，就觉得高大的学生反而不如延大的勇猛。倒是我认识的高大的几位朋友，的确是很讲义气的。

延大建立于1885年，比梨大早一年。跟梨大一样，也是个基督教大学。所以西化气息比较重，号称“民主延大”，校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校训是“自由”、“真理”。学生多来自中阶级，喜欢喝啤酒，具有自由气质，但我看团队精神也非常强。宽敞的主路旁边有一座雄鹰雕像高耸入云。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上面那只雄鹰每天俯视着下面来往的学生，它如果看到有一个处女，就会马上展翅飞去。可是多少年过去了，雄鹰还屹立在那里，永远展着翅，但就是飞不去。我听了马上想，这似乎是鲁迅笔下的乌鸦。延大中文专业的研究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思维敏锐，视野开阔，虽然号称西化，其实一样地忧国忧民。我积极鼓励一个梨大的本科毕业生去延大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我觉得延大的中文专业是生气勃勃的。2000年夏天，我陪小说家余华去与延大学生座谈，学生们对余华作品的解析、对鲁迅和东亚问题的理解，都给余华带来了很大压力。我有一次在延大讲座后与一群教授学生一起去爬北汉山，在与他们的真诚交流中加深了我对韩国学界的了解和好感。

我所在的梨大位于汉城的西大门区。这一带共有四所大学：梨大、延大、弘益大学和西江大学。而骄傲的延大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只有一所大学，即延世大学。其他三校都算不得大学：梨大是女子化妆学院，弘益大学是美术学院，西江大学则是高中四年级。当然这是一种清高的玩笑，三校并不买账。有一条火车道穿过延大和梨大门前，在延大那边是从高空的天桥上穿过，到梨大这边是从深谷的桥洞中穿过。所以梨大人得意地说：哼，从他们头上过去的火车，只能从我们脚下过去。不过梨大人有个迷信，即当火车从脚下过去的时候，赶紧许个愿，就会实现。我在那里许了好几回愿，一个也没影。大概是管女不管男吧。或者只能实现这样的愿：让我找个延大的男朋友！我听过西江大学的教授的发言，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水平并不低于其他大学。至于弘益大学，美术专业是其王牌，不免掩盖了其他专业的光辉。地铁有弘益大学这一站，我专门去参观了一次。门前的小公园里正好有个小型美展，主题是同性恋，用女性的视角画出的男性肉体，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温柔，很有深度。校园里也弥漫着美术气氛，到处是雕塑、画布，学生的服饰也颇有个性，比起梨大和延大的中产阶级追求来，更像学生一些。弘大门前的毕加索街，鳞次栉比着充满异国情调和艺术气息的咖啡馆、俱乐部，它与梨大旁边的新村，加上大学路，号称汉城的三大青年街。

汉城有三所大学的名字都带有“国”字，即东国大学、建国大学、檀国大学，合称“三国大学”。我搞不清他们的排名，反正只要在汉城，即使不太有名的大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也超过外地的有名大学。东国大学是佛教大学，我认识的几位教授，学问和待人都还蛮不错的，只有一个助教由于办事太不负责任，使我不愉快过。东国大学的樱花很出色，每年暮春三月，慕名前往者络绎于途。建国大学那里，我参加过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汉江附近。校园的风景，既有新千年馆那样的宏伟建筑，也有传统的小桥流水，印象颇佳。檀国大学，我去讲演过两次，跟一些教授学生都建立了亲切的友谊。特别是黄炫国教授，他在台湾住过11年，对中国文化烂熟于心。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喝茶很有品位，对学生好像老大哥，在韩国教授中十分难得。我与他在台湾文学方面也很谈得来。

成均馆大学虽然不大，却是韩国历史最古老的大学，因为它的校史是从朝鲜时代的国子监开始算的。这样，1398年是其创始年，到1998年，建了一座600周年纪念馆，在韩国傲视群雄。我说北京大学要是也这样算，那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成均馆大学重视传统文化，校园里保留着文庙，每年都隆重举行祭奠。大成殿和明伦堂的木头都开裂了，看来需要维修了。明伦堂前有两棵400多年的银杏，用许多绿漆铁柱支撑着，这是我在韩国看到的最古老的

树。韩国凡是有木头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日本人烧光了。你到大部分旅游胜地，都会看到“烧毁于壬辰倭乱”的字样，日本人被韩国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另外朝鲜战争期间也烧毁不少，所以现在韩国虽然绿化很好，但二三十年的树就算是老树了。这里居然有400多年的树，虽然龙钟，却依然参天茂盛。我叔叔孔宪科有两句吟孔府古木的诗：“两度绕天匝地火，劫余未改旧时姿。”用于此处也很恰当。我说这全是我家祖宗的功劳。因为日本人也拜孔子，杀到了文庙，或许暂时就不撒野了吧。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博物馆藏品也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在韩学者和学生国庆联欢会，就举办在成均馆大学的600周年纪念馆。我们还到露天舞台去看成大学生表演的“四物”演奏和跆拳道。韩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视儒教传统的，所以成均馆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紧邻着庆熙大学。这是韩国的外语最高学府，其中文专业号称不逊于国立汉城大学。我多次去过外大，或者开会，或者访友。外大是韩国所有大学中对中国学者待遇最好的大学，与对待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没有等级差别，所以颇得中国学者的好感。这大概是外事工作比较多而获得的经验和素养所造成的。那里的朴宰雨教授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学问很好，待人热情，有实际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以前是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现在做学问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当我有一篇涉及韩国国民性的文章受到许多韩国人围攻时，朴宰雨教授说，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嘛。他当过外大的弘报课长，即宣传部长。一次到大邱开会，他与我住在一屋。夜里很晚才睡，次日一早，他又赶飞机去参加别的会。韩国的著名教授都是特别忙的。

不过外大的校园真让人不敢恭维，小得可怜。幸而外大背后的庆熙大学让外大借光不少，一些高中生看到外大的风景画片就报考了外大。来了才知道，那山上的漂亮的大楼都是后面的庆熙大学的。庆熙大学以韩医专业著名。韩国的“韩医”经我仔细观察，就是中医，从望闻问切，到针灸按摩，从丸散膏丹，到煎汤熬药，从本草纲目，到濒湖脉案，从阴阳太极，到五行生克，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医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山东大夫跟河北大夫的区别。庆熙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就等于是大富豪专业毕业了。据说要嫁给一个医学博士，女方必须送给男方三把钥匙：一套豪宅的钥匙，一部名车的钥匙，一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因为这些“婚姻投资”男方很快就会赚回来的。我认识一位韩医的夫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丈夫一天就赚到了。庆熙大学的风景很美，外大的人也常去庆熙大散步。北京大学韩国语专业的几个学生，被派到庆熙大学交流。我跟他们聚会过。以前庆熙大学的短训班也来过北大中文系，我带他们去过西安洛阳等地，不过那次也是他们的助教态度不逊，到处挑礼，不懂装懂，颇有几分不愉快。韩国大学的助教，都由研究生兼任，多数没有工作经验，往往看人下菜碟，既不懂“外事无小事”，又不敢无为而治，结果经常惹是生非，引发矛盾。助教的素质，严重影响着整个大学的形象。

圣公会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这所大学虽小，却会聚了很多韩国的革命斗士。白元淡教授请我去讲演时，特意请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运动展览室。那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稿和实物，我看后十分感动，从心底吟出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并不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韩国的“中央电大”。这是我去那里开了一次会才知道的。韩国没有专门的电视大学、电影学院。这类艺术人才都直接从综合大学里选拔。所以韩国的影视界学院气不够，专业基础不厚。不过韩民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从来不怵镜头，具有天生的表演欲，所以也自有其随意的优点。另外“放送”一词包括了广播和电视，这是少有的比中文词汇还要精炼的例子，我给学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不是中国的私产，汉字里凝聚着东亚人民共同的智慧，所以我们都应该学好汉字。

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

经里的“采采栗苳”。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叠叠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在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几十年来互不服气，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大竞赛，使得彼此的革命“段位”节节攀升。连我所在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所被延世大学讽刺为“女子化妆学院”的专出贵夫人的学校，也终日“群雌粥粥”，她们的学生领袖把头发剃得几乎成了秃瓢，颇有刘和珍杨德群当年之气概。这些具体的学潮当然有韩国自身的背景，不一定需要胡乱地“东施效颦”。但是这种革命的精神却是茫茫21世纪的指路明灯。在大部分韩国人还盲目崇拜美国的同时，韩国的清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揭露美国对韩国平民的杀戮，对韩国资源的掠夺，对韩国政治的控制和对南北统一大业的掣肘与破坏。韩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对穷凶极恶的美国和心怀叵测的日本都是一柄闪光的利剑，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必会产生积极的推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革命精神，理当成为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

(此文发表后，韩国右派很不满意，左派则略有惭愧。)

真龙藏不住

浪迹江湖的我，今年被北京的风沙吹到了汉城。心想这也好，就算是被迫隐居，“勉从虎穴暂栖身”吧。——中国敬龙，韩国尚虎，可谓是一对“龙虎邻居”。寂寞无聊之际，忽有三韩侠士崔容晚、李政勋二君邀我同看李安的新作《卧虎藏龙》。此片在中国大陆尚未公映，故而洒家咧嘴一笑说：“吾乃中国观看此片之第一人！”

《卧虎藏龙》本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先生的力作。王度庐的代表作“鹤铁”系列共有5部：《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5部作品既连贯又独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以神奇的武功和紧张的打斗取胜，而

是通过武侠人物的爱情悲剧来透视人生，追问命运。王度庐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创造了“悲剧侠情”模式，对后来的梁羽生、金庸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而越是优秀的小说就越怕被搬上银幕。尤其是武侠小说，被香港的低能导演和弱智影星们摧残得面目全非。金庸先生毫不客气地说过，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港台影视界拍成的片子后，“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挨打”。这里的原因就是，那些武侠影视抽空了武侠文化应有的人文精神，只剩下满足自己病态心理的血腥打斗和企图忘记自己奴隶身份的港台式的肉麻搞笑。这样的作品被批判、被蔑视、被遗忘，都是理所当然的。

相比之下，这部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说是武侠电影史上的一次突破。影片抓住了“命运”的问题，抓住了“人应该怎样活”的问题。李慕白和俞秀莲终生相恋，但却不把他们的爱情变成现实。李慕白说：“越是握紧拳头，手心就越是什么都没有；松开手，你才觉得拥有一切。”李慕白用生命教会了玉娇龙这个道理。玉娇龙和她的情人罗小虎也没有“终成眷属”，他们继续浪迹在无边的江湖上去寻找他们的梦。

抓住了这个“题眼”，别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整个影片笼罩在抒情的基调里，笼罩在淡淡的银色的悲凉里。武打设计既具有惊心动魄的现场效果，又具有如梦如歌的优美意境。演员的表演内在、含蓄。周润发第一次学会了以“不表演”来表演，体现出一种真正男人的魅力。章子怡则把玉娇龙的娇凶结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搞笑的地方也符合故事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节外生枝和鼻孔里插大葱的毛病。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打斗”为中心，决定了《卧虎藏龙》必定要在武侠电影史上大书一笔。

知道王度庐的人很少，但我早就确信他的名字必有大放光彩的一天。李安，周润发，章子怡，还有作曲的谭盾，演奏大提琴的马友友，他们都像影片中的英雄一样，是藏不住的真龙。是啊，这个世界，往哪儿藏啊！

（当时就跟韩国朋友和学生说，此片八成要获奥斯卡奖。果然言中后，学生皆以为奇，并有学生从网上翻译了此文，遂作为范文讲了一课。）

特立独行的葵花

韩国古代文人曹伟写有一篇《葵亭记》，写他谪居时比较穷困，在几丈大的园中盖了一座小亭，园中别无他物，“只有葵数十根，翠茎嫩叶，动摇熏风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问他为何不取松梅菊兰之类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这种“软脆之物”命名。曹伟首先说正因为葵不为人所重，所以才适合于自己的处境，“以弃人而配贱物也”。然后他又说葵虽弃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随阳而倾，谓之忠可也。”二是“葵能卫足，谓之智可也。”而这忠与智，正是“人臣之节”也。

我读此文，首先想到了杜甫的“葵藿仰阳春”，然后就想到了“文革”时大为风光的向日葵文化。在杜甫那里，葵与藿混在一起，还具有类的性质。只是表示忠心的一个比喻，还没有赋予葵以单独的价值。到了曹伟这里，葵就独立出来，成为亭的名字，表示着一种虽被抛弃而仍然忠心不已的节操。但这里，仍透露出一种无奈，透露出这是因为做不成松梅菊兰而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到了“文革”时期，向日葵的价值却有超越松梅菊兰之势。那时最美丽的花就是向阳花，不但有大幅的宣传画，连床单桌布之类日常用品上也经常是满地向日葵。我上小学的美术课，第一课画红太阳，第二课就画向日葵。

不过，向日葵的实物，我是并不陌生的。东北地区的人爱吃瓜子，所以这种植物种得很多，连城市里也在楼前屋边到处种些。我和一些孩子夏天经常去“恭行天偷”。潜入园中，折下大花盆就跑，那时脑子里才不管他什么向阳不向阳呢。印象中那向日葵一点也不美，耷拉着脑袋，一折就断，的确是“软脆之物”。我们也知道它从早晨起就随着太阳转脖子，但是这种“仰脸相随”的形象并无什么美感，只觉得不过是任人践踏、任人攀折的贱物而已。

曹伟与杜甫，借葵之向日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这在今天的一些正人君子看来，也许要批判为“奴性”和“暴君的帮凶”之类。但我以为，在那个时代，这恰是他们自由意志的体现，这和把自己比喻成“涧底松”、“篱边菊”、“墙角梅”具有同等的人性价值，或者说，这正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表现。但若是把少数人的情趣强加到多数人的头上，则会适得其反。要人人都做向阳花，结果是人人乱扔瓜子皮。独立人格必须自己去建立，既不能赐予，也不能克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大家一起去斗争，若是争取自己的人格独立也跟着一大群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吆五喝六，并且排斥和打击那些偏偏不愿“独立”的人的话，这首先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意义。在一个人人要做十八棵青松的时代，青松的价值已经跟瓜子差不多。那么在一个号称独立崇拜个性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尊重那些不要个性的葵藿们，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呢？

（此文标题为发表于《信报》时，著名批评家骆爽先生所赐。有朋友看此文后，说梵高一定会喜欢的。）

板门店的枪声

来韩以前，不知道韩国电影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准。一天晚上，吃过冰激凌后，我请金恩惠等两位学生看电影，目的是为了让她俩给我当翻译。电影是赫赫有名的《JSA》，即《共同警备区》。这是根据朴上延的小说《非军事地区：DMZ》改编成的。三八线两侧，是联合国和朝鲜联合管辖的“共同警备区”。

一天深夜，朝鲜一方的哨所内传出了枪声。影片以哨所墙上弹孔的特写镜头为开端，叙述了对发生在板门店的神秘枪击案的一场复杂的调查。

联合国派来负责调查的主力官员，是一位漂亮的具有韩国血统的瑞士女军官苏菲。她根据南北双方幸存者的陈述报告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两份报告疑点甚多。韩军的李秀赫班长，说他被绑架到“北韩”后，在艰难的逃跑过程中，向“北韩”军人开了枪。与此相反，“北韩”的幸存者吴敬弼中士则说，南方首先越过军事分界线袭击他们。一粒消失的子弹壳就是这起命案的锁钥，可是两位当事人从此却一直缄口不言。在那神秘的“不归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共同警备区是南北冷战的象征，它不仅是半岛南北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美国的分界线，是东方西方的分界线，是两种人类理想的分界线。双方军人在相隔仅几步的距离内彼此面对面盯着站岗，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板门店谈判和斧头冲突案(1976年)都发生于此。斧头冲突案后，美韩一方为纪念丧命的美军波尼帕斯大尉，便又称共同警备区为波尼帕斯基地。

守卫共同警备区的韩国部队是一种特殊部队。他们要先到美军服役，然后经过选拔而被派遣到此。共同警备区士兵虽然是韩国国籍，但名义是联合国部队的成员。

因为南北双方隔桥对峙，所以他们每天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可是军人也是有感情有良心的活人。不太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察觉到每天见面的“北韩”士兵也是同胞，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青年人。

一个深夜，在巡逻中因撒尿而掉队的李班长踏上了一颗地雷。万分危急之中，经过那里的“北韩”军人吴中士救了他。从此，他把吴中士当作哥哥，二人产生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忘记了休战的现实，李班长每夜冒着危险越过三八线。他们在“北韩”的哨所内一起喝酒，谈女人，交换礼品，还一起讨论故乡。多少个欢乐的夜晚，如同梦境一般。然而悲剧降临了，“北韩”军官的巡查，迫使他们卷入了预想不到的枪战。如果是在后方的城市或乡村，这样的友情是非常平凡的。可他们是边界上的哨兵，所以不得不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兄弟。

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全方位摄影，摄影机往返交错地拍摄着哨所内部。场景紧张到令人屏息，同时使观众对于半岛南北分裂的现实深深叹息。观众和漂亮的苏菲都看出了，双方指挥官都知道这次枪战的内幕。可是他们不愿意公布真相。李班长和吴中士也宁愿把真相埋藏在心里。但最后因为不能解脱的内疚和人道主义激情，李班长和他的部下都自杀了。朝鲜人民军战俘的女儿苏菲陷入了无底的悲哀。

本片导演宣布：“我们不但利用神秘的电影结构造成让人紧张的气氛，而且以回忆的场景和幽默的穿插唤起被遗忘的人道主义。然后电影在悲壮中结束。”

朴导演对于电影视觉语言的遵循和突破，都表现出新一代韩国导演的才华。高达30亿韩元的拍摄费用，没有给影片带来负担而是带来了极大的收益。朴导演在尽情发挥了电影的娱乐功能之后，在结尾的镜头里利用一张照片浓缩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南北方分裂的悲剧。四名主人公在一个画面内由不同的角度互相对视着站岗值勤。南侧，一个西方女游客的帽子被风吹落到北侧，顿时一片紧张。粗犷的朝鲜人民军吴中士俯身拾起，微笑着递过来。那一刻，全世界的阳光都灿烂了。为了那一刻，我后来又看了一遍《JSA》，没用翻译。

(强烈建议中国文化部门引进此片，使人民体会分裂之苦、统一之甜。)

注：关于“南韩”、“北韩”的称呼问题——通常所说的“南韩”、“北韩”，本来是朝鲜半岛上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战后在冷战体制下分裂为实际上的两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都予以承认。它们的正式国名分别是“大韩民国”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国名所指的领土包括整个朝鲜半岛(韩国叫韩半岛)，即包括对方。所以单独指一方的时候，可以简称为韩国、朝鲜；而一般同时说二者的时候，要说“南韩”、“北韩”。这样的非正式称呼又准确、又客观。韩国人都是这么说的，而北朝鲜则说成“南朝鲜”、“北朝鲜”，道理相同。本书是从客居韩国的立场写的，所以用的是“南韩”、“北韩”。用南和北的说法，他们双方都能够接受，而正式的国名，他们却彼此都不接受，虽然他们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但一般不用正式国名互称，谈判时也只用“南北会谈”或“北南会谈”的提法。如果我们外国人假装“客观”，同时叫他们的正式国名，那恰好是他们最反感的，因为那等于是支持半岛“两国论”，等于永远反对他们的统一。就好像西方人把“中国”与“台湾”或“中华民国”并列给我们的感觉一样。我们宁肯听“海峡两岸”这样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提法。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二者对举的上下文里，还是用“南韩”、“北韩”为合适，(同样，“韩半岛”、“韩战”等提法也加上引号后部分保留。)这样才能突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的分裂之痛，表达我们支持统一的一片真诚。欧美等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用的。本书为了出版方面的格外慎重，多处使用了“南方”、“北方”一类的概念，在不是并列的情况下，也分别酌情使用了正式国名或简称，但作者的客观立场是一致的。特此说明。

魂断板门店

4月20日是谷雨，距离“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时节已经半个月了。然而一路上，每个中国人的“魂”都已经被勾起来。大家有的谈笑，有的假寐，有的发呆，其实都不过是掩饰和体味着内心深处那股复杂的滋味。板门店，曾经让6亿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个小山村，就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了。豪华大巴在1公里1公里地逼近“三八线”。我心中默念着一个相声里的台词：“快来买，快来看啊，看一看我的纯毛线啊，不管是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还是王张江姚吴法宪，都比不上我的纯毛线啊！”三八线，不可一世的美国人第一次老老实实坐下来的地方，遥遥在望了。然而我们却是穿过“联合国军”的防区前往这条线的，这似乎包含着什么历史性的讽刺。一团心绪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干脆不去剪和理，看完了再说，那感觉说不定要消化个几十年呢。

看见了铁丝网，大家兴奋起来。然而一直期待的紧张气氛却始终没有降临。虽说是一道又

一道的关卡和检查，但跟履行坐地铁逛公园的手续也没什么分别。韩国士兵一个个奶气未脱，一看就是学生兵，我一个人可以对付俩。西洋士兵一个个吃得白胖粉嫩，好像是在夏威夷度假。我脱口说了一句：“军容如此不整，北边打过来岂不是摧枯拉朽？”随后又吟了几句陆游的诗：“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然而转念一想，难道说我不喜欢这一片大好的和平景象么？分界线南北的人民本来不就该铸剑为锄，在这三八线上歌舞升平么？

终于踏上了那条线。站在八角亭上望去，韩国士兵摆开非常“威武”的雄姿：头戴钢盔，眼配墨镜，双脚呈“大”字撑开站立，双拳紧握斜伸在身体两侧，整个人好像一个世界的“界”字。不知是谁设计的这个姿势，的确很好看，可以作为“耀武扬威”这个成语的活注解。我和别人一样，也与这些士兵合了影，但总觉得这里面表演和夸张的成分多了些。因此我便觉得这些士兵颇有几分亲切，好像是我的学生或兄弟。我很想跟他们开一点玩笑，但又怕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我知道，他们那样一动不动地“种”在那里，恐怕比中国天安门的国旗班卫士还要辛苦。

抬头看看对面，北边只有一座灰色的平顶楼，门前高高的台阶上背手站着一名头戴大沿下十五年帽的军人。那军人气度从容，不怒自威，浑身无一处紧张，但也无一处松懈，用一句武侠小说里的话，叫做“渊停岳峙”。他就一个人，俯瞰着这边所有的人，他的背后，是起伏的山野和辽远的蓝天。

看过了遣返战俘的“不归桥”和朝鲜高达160米的世界最大的国旗，我们上车返回。在参观纪念册上，我题写道：“人类的伤痕”。我经常感到，不论南边和北边，都有一种“不平之气”。此刻，我多少能够理解这种“不平之气”了，一个被拦腰斩断的民族，哪里能够“心平气和”呢？

中午的燥热包围上来，忽有一缕凉风拂面而过。我意识到，那是北边吹来的风。空气，是任何边界阻挡不住的，正像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亲人的思念。

(本文曾在中韩两国报刊网站发表，并被英国BBC电台播送，反响甚佳。)

迟到与礼数

朝鲜高宗时代朴在馨纂辑有一部《海东续小学》，里面记载的金鹤峰出使一事，颇有趣。金鹤峰在宣祖时曾任副提学，一次奉命出使日本。到对马岛时，岛主宴请他却自己迟到，而且“乘轿入门，至阶方下。”金鹤峰大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至，岂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于是罢宴而去。吓得对马岛主杀了轿夫，斩其首来谢罪。从此以后，“倭人敬惮，待之加礼，望见下马。”

此事可以表现出那一特定时期的韩日关系，也可以表现出韩国人脾气之一端。但是，金鹤峰对礼数的要求是建立在“宗藩”的基础之上的，有点“以势求礼”的味道。其实，即便对马岛不是藩臣，即便大家都是平等的甚至反过来宗藩易位，请人赴宴也不该迟到。否则，便不是“知礼”。而只是“识趣”而已。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韩国古代长期蔑视日本，认为他们是不知礼仪的夷狄。《宣祖实录》卷37记载朝鲜国王的话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朝鲜中期的儒学大师李退溪在一篇《乞勿绝倭使疏》中劝告国王不要与日本一般见识，原因是“禽兽之不足与较。”李退溪的态度与金鹤峰是有些不同的。金鹤峰是与之较，示之威，李退溪则主张“以夷狄待夷狄，则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夷狄。”李退溪认为如果与夷狄“辩是非，争曲直”，就好像“督禽兽以行礼乐之事”，除了逼迫禽兽咬人以外没有好的结果。

我在韩国讲学二载，韩国各界朋友请我吃饭无数次，主人迟到之事十有七八。有一次，某

上司宴请全体中韩教师，大家枯坐许久，此公方到，既不解释，也不问候，入座便与韩国人用韩语商谈某事甚久。其他中国教师皆有怒色，我只好大讲笑话，代韩国上司化解危机。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中国人一般认为，韩国菜肴清汤寡水，没啥可吃，赴宴纯粹是给韩国人面子，是为了“尽礼数”。而韩国朋友却往往忽略了此中的善意，不知不觉导致了彼此感情的疏远。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南方某著名大学的教师，甚至宣布拒绝一切韩国人的宴请，大发金鹤峰式的脾气。我因为知道韩国人并无恶意，是疏慢而不是故意侮辱，所以也就习以为常，一般采取迟到15分钟的做法，与主人差不多同时到达，这样就免除了双方的尴尬。由于我有很多这类油滑的窍门，而被一些中韩朋友戏称为韩国通。

礼数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要看你遇见什么人了。遇见金鹤峰，则失礼之人会自取其辱，因小失大。遇见李退溪，则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被看不起。不计较，其实可能是更大的轻蔑。这些道理，耿直的人不一定会想到。因为韩国人脾气火爆，中国人也大多不愿意讲。我把它讲出来，不仅是想提醒同为礼仪之邦的韩国朋友，也更希望中国朋友戒之哉，戒之哉！

(中国现在喜欢迟到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了。)

知识分子的人情债

许多中国学者以为韩国实现了民主化，从此就会一路顺风地奔向光辉灿烂的锦绣未来。这种想法非常类似当年看到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就以为共产主义离我们只有一袋烟的工夫了。实际上韩国民主化以来，韩国的知识分子在欣喜的同时，也饱尝了打掉牙吞落肚的苦辛。从卢泰愚“民主化”政权上台后，众多知识分子一直怀着一种“多数暴政”的恐惧，并保持着对许多不公正现象的沉默。这里面当然包含了他们对长期民主斗争的肯定，包含了对烈士洒下的鲜血的肯定。社会上弥漫着一种要对开创民主化改革新时代的当政者给予最大宽容的气氛，因为他们曾忍受了30年的种种痛苦和压迫。呼唤民主的人对实行民主的人欠下了一笔人情债。

客观地说，面对“民主”、“统一”、“正义”、“改革”等掷地有声的口号，有谁敢说一句“我不赞成”呢？最多不过嘟囔一句“改革是好的，但这种方式是否值得考虑。”即便如此，也难免招来愤怒。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旦批评了“文官政府”或“民选政府”，就会被当作“守旧反动”的留恋专制的人。

于是，知识分子的空间内只有一种自由主义声音响彻云霄，而另一些人却畏首畏尾、噤若寒蝉，形成了一种新时代的“白色恐怖”。在“反民族、反和解、反改革、反统一”的达摩克利斯宝剑之下，人们对“现政权式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粗暴的大众主义只好唯唯诺诺。打破专制时代的万马齐喑局面，无疑是令人拍手称快的，但是，对于神圣的自由来说，任何形式的“一刀切”都是同样危险的。真正的自由，当然应该包括对自由本身的质疑。

可喜的是，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官政府”和“民选政府”的太多失败和失职自我打碎了“正义垄断”的神话。那些谨小慎微的“另有想法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抛弃缩手缩脚的理由了。一些报刊呼吁，该是这类知识分子大声疾呼，拿出新方案的时候了。

知识分子对民主化政权似乎欠着一笔巨大的人情债，但是现在他们觉得这笔债也该还够了。“民主化政权”及其附属机构是如何经营国家的，人们看够了也体验够了。而且，现在知识分子正感受着那种“民主化专制”的滋味。因此有人说，现在该是韩国知识分子全面着手准备“下一个时代”的时刻，也是让韩国再次获得新生的时刻。

在这种对呐喊的期待中，部分知识分子为了挑起“未来@韩国”的旗帜发出了崭新的呼声。这对饱经忧患的韩民族来说，是极为可贵的一件喜事。因为，这是知识分子打破长久的沉默，宣告不再惧怕任何“以大众的名义”的非难与恐吓之举。对于一个驻扎着数万美军的国家

来说，敢于怀疑“民主”，这是需要一点超人的勇气的。

韩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当务之急是摆脱极端主义思维模式，摆脱专制与民主非此即彼的翻锅烙饼争吵，努力去开拓一种健康务实的“中道”。这“中道”既不是各种意见的算术平均值，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臆测。这应该是多数公民予以首肯或可以接受的带有指导性的共识，是老子所云的“和而不同”的光谱。站在这一高度，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抛弃褪色的已经被金融寡头们大面积污染的理念，勇敢地向包裹在“民主”大旗下的丑恶挑战。

(此文不敢说是给韩国知识分子指路，只能说是给自己提醒。)

在韩国看奥运

正如下棋打牌都能流露人的真实性情，一切体育竞赛也都是观察人性的好机会。像奥运会这样的全球大游戏，如果只去看看谁家跑得快，哪国金牌多，未免可惜，仿佛吃饺子时只顾了计数却忘了品味儿，这也是各国体育报道常见的毛病。新千年的首届奥运会，我是在汉城看的。我和十二亿中国俗人一样，每天牵挂着自家的金牌数。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又一次集中体会了韩国的国民性。

首先说电视里的韩国运动员，有两大特点，一是牛，二是哭。这个牛，从入场式就可看出来，器宇轩昂，示人以强。比赛时，脸一律绷着，看对手如老虎看小羊。如果赢了，一定要手舞他们的太极旗疯狂奔跑，让全世界都知道“俺是韩国人，俺们韩国人赢了！”战胜对手时，满面轻蔑的表情，虽然按照礼貌跟对方握手，但眼睛却看着别处，仿佛公主赏给乞丐零钱。我在他们的脸上似乎读出了许多成语：睥睨群雄、不可一世、眼空四海、气冲斗牛……总之一个字：牛！只有那位获得射击冠军的小姑娘，恬静平和，不卑不亢，用中国的美学看来，像个世界冠军的样。

哭是奥运会这样的大戏中常见的画面，但韩国人格外擅长。他们是胜也哭，败也哭，场上哭，场下哭，抱着教练哭，望着国旗哭，健儿在悉尼哭，父母在汉城哭，男人哭得“泪飞顿作倾盆雨”，女人哭得“梨花一枝春带雨”……“然则何时而乐邪？”吾未之尝见也。这个哭有时是很感人的，因为韩国人的确不容易。曾经几乎是世界上地位最低的国家，今天在奥运会上排名十二。他们的人口不到全球的百分之一，国土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半岛南北加起来也只有中国的一个中等省大，但是他们却拿到了差不多百分之三的金牌。而且这些金牌大多不是必然的囊中之物，而是拼命拼来的。想想拥有十亿人口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印度只获得一枚铜牌，韩国人能不“感极而悲者矣”？中国金牌数虽列第三，但你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还多，你的金牌有五分之一吗？所以若按照比例计算，韩国的体育成绩是超过中国的。

当然哭得太多也显出韩民族脆弱的一面，显得风度不够，心灵很容易被外物左右，没有大家气魄。但韩国本来就是小国，用不着像中美英法俄那样深沉。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哭就哭吧。

其次说后方的观众和转播。我的一个感觉是，韩国人只关心有韩国人参加的比赛，美国的也关注一些，其他的就可有可无了。所以在汉城看电视不容易迅速了解奥运会的全貌，我必须每天上网去补充信息。每有韩国人获胜的比赛，电视台必反复播放，频率远远超过中国。有一场柔道比赛，南边选手把北边选手压倒在地，电视里采用蒙太奇手法十几次、几十次地重复这一瞬间，我作为外国人都觉得有点不舒服。电视台是如此地“爱国”，观众更是万众一心。我有两昼夜是和一群韩国人以及几个西方人一起看电视的。韩国的年轻朋友在荧屏前，肌肉绷着，拳头攥着，韩国每得一分，他们女的尖叫，男的狂吼，把我也感染了跟他们一起喊起来，几个西方人则笑得直摇头。他们问我中国人不是这样吗？我说中国人跟你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主要批评中国，经常骂这个球臭，那个人笨，并不一定非得把别人都看成敌人才算是爱国。我的话他们不大理解。当我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运动员之间友

谊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比赛，别人都支持鼓励他，令我啼笑皆非。当电视里播放中韩之间的比赛，比如乒乓球羽毛球之类时，韩国人知道不是中国的对手，便纷纷借故离座。他们不能忍受在我的面前目睹同胞被宰。他们每得知中国又获得了金牌，便对我有所疏远，不像我这般可以超然地欣赏一切比赛。他们见中国一直紧随美国，不相信我说的中国是“坐四望三”，怀疑中国有超过美国的野心。我在心里说：“可爱的韩国人哪！”我曾经以为中国人是最爱国的，但现在发现比韩国人要差十倍。每一个韩国人都能够自觉地维护他们的民族利益和尊严，尽管有时做得过分，起了相反的效果，但对于这样一个半岛民族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狂热的，但好像只让人感到一点不快和好笑，还不会造成太大的世界危害。假如一个泱泱大国也这样以邻为壑，惟我独尊，那世界局势就颇为不妙了。所以，中国人虽然经常屈己从人，经常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是仍然比斤斤计较、讳疾忌医式的爱国主义要好吧。

怀着这样的思想，我非常担心这次中国排名第二。那样的话，“中国威胁论”又要甚嚣尘上，美国日本又有借口挑拨中国和别国的关系了。我此时忽然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说“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为什么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中国领导从来没见过金牌第一。讲仁爱、重信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在体育这样的余事上，也充分显示出来。我在心里祈祷：“中国，你少得几块金牌吧。”果然在最后一天，俄罗斯这只北极熊傻呼呼地超过了中国，继续追在美国身后度那“伴君如伴虎”的生涯。我也因为中国失去了几块囊中之物而加深了与一些韩国朋友的友谊。十月一日，大使馆举行盛大宴会，召集数百在韩学人共迎国庆。大家都觉得这第三的位置最好，既能够自励，又可以防患。一片豪爽的哄笑声中，鸡鸭鱼肉被吃得精光。立在服务台后的一排韩国侍者，呆呆地望着这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韩国人要真正理解中国人，路还远呢。

(韩国学生看此文后说，您到底是表扬我们韩国还是批评我们韩国呢?)

韩国的海

在一般韩国人看来，韩国无处不好，尤其是他们的山川，简直可以用豫剧《朝阳沟》里二大娘的台词说：“美极啦——好得了不得！”我就见过好几个地方写着“天下第一江山”，“天下第一美景”等。我到江陵去时，那里赫然耸立着一块石碑，仰首一看，上面遒劲地刻着七个大字：“江陵山水甲天下”。中国人每遇此种情景，几乎是连笑都笑不出来的。不过我在韩国呆了大半年，已经跟他们混熟了。他们一旦知道你的批评是善意的时，还是能够接受一二的，所以我隔三岔五就挫伤他们一下。有一次我对学生说：“你们不要在中国人面前吹你们的山啊水的，你们以为中国只有一个香山啊？香山是中国最破的山，比它高、比它漂亮的山成百上千。你们最高峰不就海拔一千多米么？中国山东的老太太一天爬泰山能两个来回。你们最有名的江不就是汉江么？既不奔腾汹涌，又不婉转婀娜，带流不流，半死不活的。你们要是糊弄西方人来旅游，我可以帮你们一块吹，但你们连中国人也想蒙，那不等于孔老师面前卖三字经么？”

我见学生灰头土脸，挺可怜的，便又说：“韩国的山水也有美的地方，雪岳山的红叶，白马江的沙滩，到中国也能排进前一百名。不过韩国最美的风光你们却忘了宣传，在我看来，你们应该大力地吹一吹你们的海。”

韩国是一个半岛国家，除了北边以三八线为界与朝鲜接壤外，其他三面都是海。然而奇怪的是，从韩国人身上几乎看不出海的特征。假设每个人的相貌都有个“母题”的话，韩国人基本属于两类：小地主和贫下中农。你绝对看不到渔霸和贫下中渔，更遇不见什么水鬼海盗。只有从韩国人的饮食中，你才知道其实他们天天离不开海，海产品遍及每个家庭、每个餐桌。不过吃来吃去，也就那么十来种，最主要的就是鱿鱼和海藻。

所以我早有心会见韩国的海。除了在飞机上俯瞰以外，迄今我一共视察了11次，其中4次

西海，4次东海，3次南海。西海就是中国的黄海。我曾经在青岛去烟台的船上向韩国这边眺望过“海上仙山”，结果是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什么也没看着。我第一次去仁川时，天气很好，我乘客轮在海上逛了一大圈，发现海水没什么可看的，灰暗污浊，明显是黄河泥沙作的孽，我都闻得见黄土高原的气息。值得看的是曲折多变的海岸线和错落有致的大小岛屿。这里海水浅，滩头多，岛屿形成一座座掩护舰船的天然堡垒，在军事上是绝对的易攻难守，怪不得当年麦克阿瑟选择这里偷袭，一举扭转战局。如果在此每天表演“仁川登陆”，一定会吸引大批游客。不过朝鲜战争美韩一方是最终失败者，他们恐怕是不愿意自揭疮疤的。

仁川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到苏来浦口吃生鱼片。这是西海最大的水产集散地，在约有王府井那么大一片的市场上，几百家鱼档鳞次栉比，各种刚刚“登陆”的鱼鳖虾蟹在不断换水的水池里跳跃翻滚。同伴说这里好像龙宫，我看不如说是“鱼的地狱”。成千上万的游客在那里挑选，讲价。选好鱼后，档主麻利地对鱼进行活剥凌迟，有时那鱼的一半已经被剥到盘子里成为细细的鱼片，而剩下的一半露着白厉厉的骨刺，还在扭动挣扎。顾客可以到旁边的饭馆中等待，等不及的饕餮之徒，就在旁边掏出自带的辣酱、芥末，上口不接下口地吃了。说实话，那天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的鱼片，也是印象最深的美味之一，我有许多瞬间吃到了“忘我”的境界，或者说达到了“吃的高潮”。我真的明白了俺老祖宗为啥说“脍不厌细”了，真的明白了古人为啥思念起家乡的生鱼片就连官都不做了，真的明白了中国人为啥把最好的艺术叫做“脍炙人口”。但是一想起杀鱼的场面，不禁非常内疚，觉得自己是野蛮人。又不忍心，但是又要吃，怪不得孔子说“君子远庖厨”。我想，这就是人类的虚伪吧。

仁川我在雨中又去了一次。另外两次去西海是在韩国的发祥地江华岛和泰安，感觉与第一次大同小异。然而去东海的几次，感觉就不同了。韩国的东海，海岸线平直，水深洋阔，纤尘不染，既宁静，又渊深，是真正的太平洋气象。我在正东津对韩国朋友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海。写日记的时候想描写一下，可觉得写不好，就放弃了。后来忽然想起冰心在《寄小读者》中似乎有一段写海的文字，与我看到的相仿佛，找出来一看，居然写的就是韩国的海！我把它剽窃下来，算是我的感受：

到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阑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了开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

看，连冰心奶奶都觉得写不出呢，我干脆不写了，直截了当地宣布，韩国的东海，是世界上最美的海。这里不宜于登陆杀人，不宜于喧嚣野餐，只宜于赏心悦目，只宜于骋怀遐思。可惜，韩国有这么漂亮的海不宣传，却只顾吹嘘他们的泡菜和按摩什么的。我想告诉那些旅游高手，如果到韩国，一定要去东海。

我把对韩国的海的感受讲给学生，又给她们读了冰心的那段文字，她们露出愉快和感激的目光，但最后还是说：“孔老师，我们韩国的海当然好，别的东西也好嘛！就是嘛，就是嘛……”我没有办法，只好用天津话说：“就是嘛？就是嘛？”她们没听出来，于是皆大欢喜，课堂上洒满了国际主义的温暖的阳光。

比发表在报刊上时略有改动，因为后来又多次看了韩国的海也。

传说与国民性

经常与韩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某些韩国人不大守信用。约会迟到或者不到是常事，说过的话转眼就不算数。朝令夕改，变卦食言，他们做起来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而且他们这么做，并非是对你有什么恶意，完全是一种习惯。他们有时也会说对不起，说完了依然故我，令你哭笑不得。日本人夸张地咒骂韩国人是“天天撒谎的民族”。中国在韩国的某个组织告诫初到韩国的中国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于韩国人答应你的事，不要当真。”

我想，一个民族倘若给人家留下这样的印象，的确脸上无光。但是，一种习惯既已成为普遍的国民性，那就可能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在韩国古代的传说中，试图探询一点其中的奥秘。

韩国现存最早的一则寓言是著名的“龟兔之说”。当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重臣金春秋出使高句丽求援。高句丽王乘机索要新罗领土，金春秋拒绝，于是被扣留，命在旦夕。金春秋贿赂高句丽某宠臣，那宠臣便给他讲了龟兔之说：东海龙女生病需要兔肝，一个大龟上岸，骗兔子说海中有仙岛，它驮着兔子游到深海，才讲出实情。兔子说，我是神兔，没有肝也能活，只是刚才把肝拿出来洗了，还放在岩石上呢，我们回去取吧。一上岸，兔子就跑了。金春秋听后，就答允了高句丽王的领土要求，等被送出高句丽国境后，才说我的话不算数，我只是想救活自己而已。后来，金春秋又去大唐求救，在唐朝帮助下，灭了百济、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并成为第29代新罗国王。

韩国人一直把这个传说当作“智慧”的典范世代流传，后来还出现了《兔子传》等各种形式和版本。但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此中隐藏的负面因素。这个传说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危险的逻辑：为了生存，可以撒谎。龟和兔，高句丽王和金春秋，都是把生存放在信义之上，他们只有智力上的差别，而在道德上是一样的实用机会主义。相比之下，中国的传说主题多数是“信义重于生命”。答应的事情，牺牲再大也要兑现。尾生为守约，抱桥而死；商鞅为立信，一木百金；项羽不守约定，失掉天下；陈世美非法再婚，人头落地。从先秦汉唐到新中国，以信义立国始终是中华民族之本。当然，中国是泱泱大国，其仁义宽厚的王者之风也是历史形成的。韩国自古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度，一向在大国强国的夹缝间求生存，有时耍点小聪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日的韩国，已经在经济上飞跃到世界排名20名以内，目前又在毫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最优秀的韩国文化”，所以在这一新世纪的背景下，韩国人民似乎应该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弃龟兔之小智，慕鸿鹄而高翔。这对于韩国人形象的改善，韩民族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对整个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进一步团结合作，都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韩国历史上的“欺诈”行为，材料甚多。据本人所读韩国史书，除龟兔之说和金春秋骗高句丽之外，如金堤上诈降日本以放走新罗王子，乙支文德诈降隋军而毁约反击，国王用《箬童谣》诈娶妻子等，都是著名的事例。而韩国一律以“智慧”看待。）

还是叫汉城好

韩国自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民族自尊心大大增强，近年来极力宣扬大韩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此同时，则有意无意回避和淡化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韩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影响”，得到了韩国社会各方面的赞誉和资助。据说有的学者已经证明孔子乃是韩国人，虽有不同意见，但已作为“一家之言”而等待历史检验。目前又有关于老子也是韩国人的大胆猜想，但是还没有拿出强有力的学术证明。有的韩国朋友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时，问我中国人对此会有什么反应，我说不会有什么激烈的反应，肯定一笑了之。孔子是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甚至是美国人，对于中国都不是什么坏事，反而可能是很大的好事。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就是天下大同，而不太在乎血缘和血统的“纯粹”与否，假如能够证明尧舜禹也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的祖先，秦始皇的染色体跟美国总统布什家族的染色体完全一致，那对于民族交往以及世界和平都会具有相当大的促进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受到许许多多其他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中国人对此一是积极接受，二是毋庸讳言。我们吃着西域来的“葡萄”，喝着拉美产的“咖啡”，穿着洋鬼子的“西装”，走着元大都的“胡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自卑，人家的东西好，我们学会了，那就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了，非要强分你我，有时候是分不清的。比如现在韩国很多人反对使用汉字，一定要处处使用韩国自己的注音文字。我对此没有意见，因为从大处说，这有利于韩国文化精神的发扬。但是问题在于，韩国语中大约70%的基本词汇来自汉语，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的历史又相当长。韩国注音文字的发明只有5百多年，在社会上大规模使用只是20世纪的事情，直到20世纪70年代，汉字读物还在社会上随处可见。这样，强行废除汉字，就

会造成许多字词不知所云。我看到很多报刊，特别是学术论文，在一些词汇的后面，用括号标注了汉字，这说明没有汉字，这些词就难以理解，比如“意境”、“佛法”、“决战”、“议论”等。我想，汉字是我们东亚人全体的，并不是中国人可以独占的，为什么非要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可呢？消灭汉字的可怕后果已经有许多韩国学者指出了，比如历史断裂、思维硬化等，我在此不必多言。

还有一件事值得讨论，就是一些韩国人反对把首都叫做“汉城”。他们认为“汉城”这个名字包含了“大汉族主义”对韩国人民的“文化霸权”意识。韩国人自己称呼首都名字的发音是“Seoul”，所以有人主张对中国人交往时，要根据这个发音翻译成相应的汉字，比如翻译成“首乌尔”。有一位韩国老人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给我写信时在信封上写成“西蔚”。我一开始颇不明白“西蔚”是韩国的什么地方，幸亏我了解一点点韩文知识，想到“西”在韩文中读se(我就住在西大门区)，“蔚”在韩文中读u，于是明白他的“西蔚”就是汉城。我告诉一些韩国朋友，中国人说“汉城”时，根本没有他们所想像的“霸权感觉”，而是有一种亲切感。汉城是从汉江北岸发展起来的都市，原来叫汉阳(韩国很多地名与中国相同，如湖南、泰安、奉化、广州、海南、安东等)，后来作为首都，改叫汉城。“汉城”这个名字给人一种堂堂正正、气象雄伟的大都市感觉，“汉”这个字除了“汉文化”的意思外，还有“男人”的意思，给人一种威武英雄的暗示。比如中国的“武汉”和“汉中”，都是很漂亮的名称，有一则谜语叫“功夫小子”(会武术的男人)，谜底就是“武汉”。“城”的意思本来是城墙，给人坚固、高大的感觉，比如万里长城。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带“城”字的别称，例如广州叫“花城”、哈尔滨叫“冰城”、昆明叫“春城”、重庆叫“山城”……中国人听到“汉城”，不但能够感觉到它是首都，而且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宏大的、繁华的、充满文化精神的首都。如果叫“西蔚”，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偏僻的小城镇。如果叫“首乌尔”，不但与大多数韩国地名风格不同，使人以为是非洲的城市，而且中国人喜欢“望文生义”，会把“首乌尔”解释成“黑脸的人”来开玩笑，那可是真的使韩国的首都失去尊严了。如果一定要按照韩国人的发音来翻译，中国人喜欢在音译的同时加进另外的意义，那恐怕有的人会说：最准确的发音是“色窝儿”，发音虽然准确了，但意思却是“色情的秘密场所”，反而更加糟糕。还有人说成“馊味儿”，因为汉城的垃圾清理不及时的时候，街道上弥漫着一股泡菜腐烂后的馊味儿。所以我想，还是叫汉城最好。汉字和汉文化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包含了全体东亚人民的智慧。“汉城”这个名字既然是历史形成的，凝聚了韩国文化的巨大价值，就像一个有价值的商标不能随便丢掉一样，那就应该让它继续在韩国的未来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在“文革”时为了反对“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为了表现“独立”的文化意识，随便改动了许多地名，结果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现在又改了回来。希望这样的举动不要在韩国重演，希望汉城继续作为一座文化的灯塔，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沁园春·客韩

独立韩秋
叩叩芳心
代
沁园春房秃
独立韩秋。
汉江北去，
孔子挠头。
看红男绿女，
招摇过市；
肥猫瘦狗，
潇洒同流。
渴饮酱汤，
饥餐泡菜，
欲涮火锅不自由。

勒裤带，
问葱姜大蒜，
谁主沉浮？
招来百侣同游，
争说道苦行岁月愁。
叹无业妇人，
风华正茂；
有闲老者，
诟骂方遒。
半壁河山，
断碣文字，
亦敢扬眉傲五洲。
曾记否，
在上甘岭下，
万骨成丘！

注：

1. 沁园春：此词牌易填难工，且非一体，非有大力气者不能驾驭。余学浅才疏，偶戏为之耳。

2. 客韩：2000-2001年，我被北大中文系派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讲学两年。客中甘苦，一言难尽。

3. 步毛泽东《长沙》韵：毛泽东擅长作《沁园春》，其《长沙》一首，气韵沉雄而英采勃发，虽不及后来之《雪》，亦不失为词史上一流佳作。然词中“江”、“万”、“击”、“曾”、“流”等多字复出，“万”字且出现三次，不免微瑕。余不敢学伟人之大气魄，只喜在此雕虫细节处斤斤自得也。

4. 独立韩秋：别妻抛子，一独立也；韩国华人少朋友少聚会少，二独立也；此二春秋中冷眼观潮，受左派右派同时误解，三独立也。韩国四季以秋天最美，凄艳中兼以倔强，亦正合独立之意也。

5. 汉江北去：韩国最著名之河为514公里之汉江，向西北流到三八线附近与临津江汇合后注入黄海。我每学期必在各班问学生汉江之长度与流向，惜无一人能答。汉江乃韩国之标志，80年代韩国之经济腾飞便被名之“汉江奇迹”。盖韩国江河流速缓慢，沿途名胜美景不多，故学生对江河知识无甚兴趣，考试以后便置之脑后也。尝问她们世界第一长河，皆瞠目曰密西西比河，余摇头叹息，责之曰：“就知道美国。”

6. 孔子挠头：孔子在汉江边挠着头说：“逝者如斯夫！”韩国部分学者认为孔子应是韩国人。不过孔子挠头于汉江，恐另有隐衷也。

7. 看红男绿女，招摇过市：韩国少男少女普遍染发，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皆备。又喜游逛闹市，充塞道路，昼夜喧嚣。初至汉城街头，以为身在《西游记》中也。

8. 肥猫瘦狗，潇洒同流：韩国猫狗甚多，人不之害。狗随人吃泡菜而猫不改其食肉之志，故猫多肥而狗多瘦。二者无争食争宠之隙，故常同行于路。又尝见肥硕之驻韩美军，拥搂瘦小之东方少女，恬然游荡，此亦韩国一景也。

9. 渴饮酱汤，饥餐泡菜：韩国饮食俭朴开胃，永葆贫下中农本色。酱汤与泡菜终日不离，且常为主菜。外国人非但肉食者不惯，素食者亦叫苦连天。中国“文革”时曾有吃“忆苦饭”活动，以令人不忘根本。建议今后此类活动设在韩国，方知社会主义之甜与改革开放之香也。

10. 欲涮火锅不自由：在韩国常思中国诸般美食，日久则并普通饭菜之香亦隔海扑鼻而至。火锅乃常思常议项目之一，留学中国归来之韩国朋友亦时时提起。韩国亦有神仙炉、海鲜汤等火锅，但非涮食，乃煮熬各种菜类之锅，犹如将厨房移至食案也。

11. 勒裤带：去韩国前，大腹便便。至韩国半年后，腰带多扎一孔。又半年后，复多扎一孔。韩国乃减肥圣地，往返于中韩之间，常有七八斤肉之增减。街头胖人罕见，比之满街脑满肠肥之北京，令人倍觉清爽。

12. 问葱姜大蒜，谁主沉浮：韩国饮食尚辣，举凡辣椒、胡椒、大葱、小葱、洋葱、生姜、大蒜、萝卜之属，皆为不离食案之物。然耐辣程度不及湖南四川及中国北方嗜辣之徒。韩国人多自以为世上耐辣之最。实则辣椒16世纪后方普及于亚洲，此前韩国与中国之辣味皆取自葱姜大蒜。今日韩国之葱姜大蒜，多自山东进口。2000年中韩爆发大蒜之战，内因即为韩国人大蒜不可或缺而又耻于市场为山东棒子独占也。

13. 招来百侣同游：韩国积极吸引各国游客，大力宣扬韩国“半万年悠久灿烂之文明”，几乎将一切日常用品都列为文物。2000年举国大酬宾，2001年韩国旅游年，筹划了10大活动和18大特别活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及釜山亚运会。舌莲花之宣传攻势，招来大量东西方游客。中国继新马泰之后，首次对华语圈外之韩国实行团体旅游全面放开。14. 争说道苦行岁月愁：多数旅韩游客有失望之感，尤以中国游客为甚。北京游客总结韩国是三无国家：没吃的，没看的，没玩的。某青年学者建议党中央将韩国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5. 叹无业妇人，风华正茂：韩国男尊女卑情况与日本相似。女子婚后大多不再工作，以如花盛年而买菜煮饭洗衣擦地。日久则知识荒废，性情琐碎。有博士毕业而在超市破口大骂者，更有长日无聊而红杏出墙者，已成媒体评议话题。余每次口试均有一句：“你妈妈在哪里工作？”十九答曰：“我妈妈不工作”或“我妈妈在家里工作。”没有经济地位则没有一切地位，鲁迅之言犹在耳，然今日之中国，恐正向往此目标奋进也。

16. 有老闲者，诟骂方道：韩国古代号称小中华，自谓得儒教之真传，尊老之律，牢不可破。同学间年长一日，即可颐指气使，役若奴仆。退休老年成群闲逛，看年轻人稍不顺眼，辄斥骂不休。然此等尊老，非出于爱，乃出于畏，是礼教也，非礼貌也。适足以养老人之骄狂而滋青年之伪善。尝有一老者于地铁内骂一少女甚久，少女默不作声，而下车后少女俟无人处将老者踹下楼梯而死，媒体一时哗然。强人爱其不爱，必倍增其恨也。17. 半壁河山：韩国上古有马韩、弁韩、辰韩三大部落，故雅称三韩。后来又两度形成三国鼎立局面，至高丽与朝鲜时代统一。日本吞并朝鲜后，进行独立运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计了上红下蓝的太极国国旗。1945年光复后，遂南北分裂至今。半岛南北共计22万平方公里，南方仅9万余平方公里，不及中国百分之一。然虽此半壁河山，足为世界格局之急所，中美俄日诸大国逐利之焦点也。

18. 断碣文字：韩国古代一直使用汉字和中国年号。至1443—1446年，朝鲜第4代国王世宗召集著名学者创制出一种拼音文字——韩格尔，逐渐发展成今日的韩文。韩文作为书面符号大规模取代汉字是20世纪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事，韩语中70%词汇来自汉语，有时不用汉字难以读解。韩国为淡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力宣扬韩文是最科学的文字，说“该文字的24个记号能表示出所有的发音”，“对其他文字的解读率几乎达到100%的水平”，实则大谬不然，造成学生不认真掌握外语发音，喜以韩文标记，结果不论学习汉语、英语、日语、法语，皆造成平卷不分、尖团不分、儿音与儿化不分、有入声与无入声不分等根本性发音缺陷，令我等经验丰富之外教亦倍感头疼。

韩国古代历史皆以汉字写成，且中古以上历史皆存于中国史书。今后青年若不写汉字，必导致历史断裂。又韩文每字皆由两个以上字母构成，间架呆板，搭配生硬，如残条断枝两相拼凑，望之颇有不祥之气。初见韩文，疑为取自残龟断甲之原始符号也。

19. 亦敢扬眉傲五洲：韩国国土虽小，仅列亚洲第30位，世界第108位，但人口约4500万，列亚洲第12，世界第25。加以吃苦耐劳、团结奋发、勇于抗争，终于抓住机遇，迈入经济强国行列。目前经济实力列世界第11，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以此为后盾，文化、教育、体育、

政治各方面均挺进世界“肉食者”行列。故韩国民族自尊心百倍增强，有时几无一物可放入眼中，颇有五洲之内无敌手之慨。在这个世界上，强弱之势，永远是变化的。

20. 曾记否，在上甘岭下，万骨成丘：世人皆见韩国经济之腾飞及“韩流”之泛滥，或不知50年前中朝与美韩殊死一战，方奠定三八线两侧半世纪之和平。当年韩军伤残之外，仅火线阵亡者即达15万余，美军则3万余，中国军队阵亡亦十余万，南北双方军民死亡共计超过百万。仅举世闻名之上甘岭一役，志愿军即歼敌2.5万，自己伤亡1.15万。成千上万的革命和反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或英勇或无辜地倒下了，让我们收藏起他们的旗帜，扫干净他们的血迹，去升官发财吧。

那该多好啊

给梨花女大的本科生口试汉语，让她们用“那该多好啊”造句，她们经常造的是“要是我去中国，那该多好啊”，“要是我有男朋友，那该多好啊”，“要是每天不上学，那该多好啊”。看着她们又天真又傻乎乎的模样，我不禁心中暗笑。但笑罢却想，笑话学生容易，如果让我造这个句子，我怎么说呢？“什么什么，那该多好啊”，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并且宛如已经目睹了那希望实现之时的景象，从而沉醉在那快乐的景象中。每个人的心底大概都潜伏着不少这样的句子吧。出国旅游、恋爱婚姻、自由放纵，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快乐。除此之外的一切悔恨、梦想、祈祷、诅咒，也大都可以用“那该多好啊”来抒发。其实我们最憧憬的“那该多好啊”往往是我们不敢说出来的，比如“要是那家伙明天被汽车轧死，那该多好啊”，“要是我的乳房和她一样挺，那该多好啊”，“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只剩下我一个男人，那该多好啊”。这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梦”实际都是人们的正常心理，它们是人的精神平衡所必须的。劳动妇女在吵架时经常豪情万丈地把这类隐私梦展示出来，“让你这王八蛋浑身长满大脓疮，烂，烂，从头烂到脚，我才高兴哪！”“让你这小骚货一出门就让一百个大猩猩抓去，骚，骚，一年生一百个小猩猩崽子，多过瘾啊！”毒骂过后，她们吃得甜、睡得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有些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则以从不展示隐私梦为高雅，他们说的大都是“假如不发生‘文革’，那该多好啊”，“要是大家都来关心希望工程，那该多好啊”这类道貌岸然的屁话。其实他们心底的毒骂不比劳动妇女少，但劳动妇女是骂完就没事了，而知识分子狠就狠在，他会理性地去把他的诅咒变成现实。他真的会研制出一种什么药水，让仇人生满大脓疮；他真的会考证出，他仇人的儿子身上，带有大猩猩的遗传基因。许多知识分子的脸色苍白，是与他们不见天日的心理密切相关的。

这是从阴暗的角度来批评某些知识分子。而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爱说“那该多好啊”，是因为说了也没用，说了更伤心。历史无情地粉碎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梦想。鲁迅想过：“要是我学会了医学，那该多好啊！平时医治我父亲那样的被耽误的病人，打仗时便去当军医。”冰心想过：“要是天下的母亲和母亲都是朋友，儿子和儿子也都是朋友，那该多好啊，那就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是蓝天明月大海。”我们50年代想过：“全国都建立了人民公社，那该多好啊，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60年代想过：“要是大家都没有私心，那该多好啊，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80年代想过：“要是中国成为美国，那该多好啊，对，要民主，要自由，时间就是袁大头……”这些梦想逐次在现实的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鲁迅觉醒得最早，他说出了那些夹杂着无限伤痛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那该多好啊”的声音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中国和世界怎样前进，才是“那该多好啊”了。劳动妇女说出她们的心声，动力是“不说白不说”；我们说不出自己的心声，阻力是“说了也白说”。

至于我个人，对过去的事情，一般不会说“假如李自成不动吴三桂的陈圆圆，那该多好啊”，“假如中国从1949年就改革开放，那该多好啊”，“假如我大学毕业不读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工作，现在肯定是一方诸侯，那该多好啊”这些马后炮式的话。我认为既已发生

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们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埋怨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无能。而未来，虽然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努力有关的，但“未来”却又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风流艳妇，她动不动就对我们始乱终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鲁迅的“绝望哲学”，即对一切都不抱幻想，斩断过去和未来的两重诱惑，只紧紧握住现实的缰绳，或者说只肩住现实的闸门。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无实用价值的、与现实努力无关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发现这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要是死时她来看看我，当场哭死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会降龙十八掌外加六脉神剑和北冥神功，那该多好啊”。人再有修养，这些小梦幻总还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鲁迅，倘连这些也没有，恐怕是做不到“绝望中抗战”的。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但不说给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执着，不过是想着玩玩而已。这样的“修养”是值得欣慰还是悲哀呢？

所以看着那些坦然抒发自己梦想的学生，我很羡慕她们的率真。哪怕她们造的是“要是我的脚再白一点，那该多好啊”，“要是能吃孔老师做的中国菜，那该多好啊”，“要是去美国留学和去中国一样便宜，那该多好啊”这类的句子，我都感到她们是可爱的。我想真正应该嘲笑的，是我们自己。所有学生口试完毕，空荡荡的教室里剩下老夫自己时，我不禁也抒发了一句：唉，要是我现在还是学生，那该多好啊。

那该多好啊

给梨花女大的本科生口试汉语，让她们用“那该多好啊”造句，她们经常造的是“要是我去中国，那该多好啊”，“要是我有男朋友，那该多好啊”，“要是每天不上学，那该多好啊”。看着她们又天真又傻乎乎的模样，我不禁心中暗笑。但笑罢却想，笑话学生容易，如果让我造这个句子，我怎么说呢？“什么什么，那该多好啊”，表达的是一种希望，并且宛如已经目睹了那希望实现之时的景象，从而沉醉在那快乐的景象中。每个人的心底大概都潜伏着不少这样的句子吧。出国旅游、恋爱婚姻、自由放纵，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快乐。除此之外的一切悔恨、梦想、祈祷、诅咒，也大都可以用“那该多好啊”来抒发。其实我们最憧憬的“那该多好啊”往往是我们不敢说出来的，比如“要是那家伙明天被汽车轧死，那该多好啊”，“要是我的乳房和她一样挺，那该多好啊”，“如果发生世界大战，只剩下我一个男人，那该多好啊”。这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梦”实际都是人们的正常心理，它们是人的精神平衡所必须的。劳动妇女在吵架时经常豪情万丈地把这类隐私梦展示出来，“让你这王八蛋浑身长满大脓疮，烂，烂，从头烂到脚，我才高兴哪！”“让你这小骚货一出门就让一百个大猩猩抓去，骚，骚，一年生一百个小猩猩崽子，多过瘾啊！”毒骂过后，她们吃得甜、睡得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有些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则以从不展示隐私梦为高雅，他们说的大都是“假如不发生‘文革’，那该多好啊”，“要是大家都来关心希望工程，那该多好啊”这类道貌岸然的屁话。其实他们心底的毒骂不比劳动妇女少，但劳动妇女是骂完就没事了，而知识分子狠就狠在，他会理性地去把他的诅咒变成现实。他真的会研制出一种什么药水，让仇人生满大脓疮；他真的会考证出，他仇人的儿子身上，带有大猩猩的遗传基因。许多知识分子的脸色苍白，是与他们不见天日的心理密切相关的。

这是从阴暗的角度来批评某些知识分子。而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爱说“那该多好啊”，是因为说了也没用，说了更伤心。历史无情地粉碎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梦想。鲁迅想过：“要是我学会了医学，那该多好啊！平时医治我父亲那样的被耽误的病人，打仗时便去当军医。”冰心想过：“要是天下的母亲和母亲都是朋友，儿子和儿子也都是朋友，那该多好啊，那就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是蓝天明月大海。”我们50年代想过：“全国都建立了人民公社，那该多好啊，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60年代想过：“要是大家都没有私心，那该多好啊，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80年代想过：“要是中国成为美国，那该多好啊，对，要民主，要自由，时间就是袁大头……”这些梦想逐次在现实的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鲁迅觉醒得最早，他说出了那些夹杂着无限伤痛的名言：“绝望之为虚

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那该多好啊”的声音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中国和世界怎样前进，才是“那该多好啊”了。劳动妇女说出她们的心声，动力是“不说白不说”；我们说不出自己的心声，阻力是“说了也白说”。

至于我个人，对过去的事情，一般不会说“假如李自成不动吴三桂的陈圆圆，那该多好啊”，“假如中国从1949年就改革开放，那该多好啊”，“假如我大学毕业不读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工作，现在肯定是一方诸侯，那该多好啊”这些马后炮式的话。我认为既已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们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埋怨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无能。而未来，虽然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努力有关的，但“未来”却又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风流艳妇，她动不动就对我们始乱终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鲁迅的“绝望哲学”，即对一切都不抱幻想，斩断过去和未来的两重诱惑，只紧紧握住现实的缰绳，或者说只肩住现实的闸门。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无实用价值的、与现实努不努力无关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发现这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要是死时她来看看我，当场哭死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会降龙十八掌外加六脉神剑和北溟神功，那该多好啊”。人再有修养，这些小梦幻总还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鲁迅，倘连这些也没有，恐怕是做不到“绝望中抗战”的。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但不说给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执着，不过是想着玩玩而已。这样的“修养”是值得欣慰还是悲哀呢？

所以看着那些坦然抒发自己梦想的学生，我很羡慕她们的率真。哪怕她们造的是“要是我的脚再白一点，那该多好啊”，“要是能吃孔老师做的中国菜，那该多好啊”，“要是去美国留学和去中国一样便宜，那该多好啊”这类的句子，我都感到她们是可爱的。我想真正应该嘲笑的，是我们自己。所有学生口试完毕，空荡荡的教室里剩下老夫自己时，我不禁也抒发了一句：唉，要是我现在还是学生，那该多好啊。

喜战李昌镐

早就想写这篇文章，可是一直想不好题目。我不敢说“大战李昌镐”，也不敢说“苦战”，“恶战”，“鏖战”，“死战”，那都未免太恬不知耻。最后我逼问自己：“你小子跟人家李昌镐下了一盘棋，到底是个啥心情嘛？”另一个我回答说：“还有啥？高兴呗！”于是我就满怀喜悦，来回忆那次与李昌镐的“喜战”。韩国在我老人家的眼里，值得敬慕的人只有三位。第一个是在我的家乡哈尔滨奋勇击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留下“祖国安危，劳心焦思”名言的大韩民族英雄安重根；第二个是为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奋斗数十年、身残志不残的现任总统金大中；第三个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被誉为“少年姜太公”的围棋天才李昌镐。我到韩国后，在纪念馆里拜谒了安重根，在一家小饭馆抚摸了金大中当年闹革命时写的条幅，只是无缘与李昌镐有点瓜葛，不免兀自郁闷。不料苍天有眼，见我每日左手执黑、右手捉白地自己对弈，仿佛《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练习那“左右互搏”的神功一般，渐生恻隐，于是乃降下一段因缘。那日梨花女子大学校庆，校园里一万多个花姑娘打扮得莺莺燕燕，作张作致。老夫我被众女弟子勒令停课，强迫玩耍，十分孤苦无聊。下午正欲打道回府，突然脚下踩到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个围棋中的“双飞燕”定式，一大片韩国字我都认不得，却偏偏拼出了“李昌镐”三个字，遂拦截一名学生进行究问。这才惊悉为给这所公主大学做寿，韩国棋院九大年轻高手特来现眼——现场表演。我听后二话没说，直奔沙场。只见半山腰一座小洋楼外已里三层外五层地围得只够做两只眼。我挤进去一问，原来李昌镐们还没到。我问组织者可以进去看吗？答曰不但可以看，而且可以报名挑战，9位国手每人对3位棋迷进行让子车轮战。我赶紧找到负责报名的学生会小头目，居然就是我们班上比较受我宠爱的一个女生。我想起曾经因为她答不出韩国国旗的涵义，我假模假式地训斥过她一回，心中不禁悔恨，一个破国旗，管人家的闲事干什么？不晓得她会不会报复老夫。谁知她听我一说，立刻写了张条子派人送进去。一会有人出来向她汇报，她便拉我到门口往里观瞧。但见大厅内9张长桌摆了个九宫大阵，每

位国手的牌位对面摆了三个名字，老夫大名的对面恰恰就是李昌镐那厮！当时心中立志，以后再也不训斥女生。有顷李昌镐等驾到，众棋迷涌上请求签名。只见李昌镐那厮果然跟电视上看的一样，一副傻痴呆的相貌。恐怕走在街头连向他问路的人都不会有。不管挤在面前的小妖女们如何柔声曼语、翘脚挺胸，他木雕泥塑一般，如对山石草木，汗毛也不竖一根。老夫从小就不喜请人签名，党的十五大以来，更是只有别人请我签名的份。然而此时竟然破戒，请这个比我小十岁的毛头后生签了一回。在政治上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是在文化上，面对伟人，你硬挺着不崇拜，那不是明摆着装孙子吗？

战斗打响。原来参战的都是男士，围观者里也有一半是从校外赶来的男生。我见周围的几个教授学生都摆上了7个子，远处还有一人摆了8子，心想我乃天朝使臣、北大教头，总不能跟韩国人一样。但又不该妄自托大地摆上4子或5子，于是就拈了6粒黑子，轻轻放上。李昌镐过来，夹起一枚白子，就一窝高挂。只听啪，啪，啪，他下三盘棋如同下一盘棋。虽然要走过来走过去，但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棋盘，只是毫无表情而已。二十几个回合过去，我发现了他的厉害。这厮真是大家风范，他不下怪着、奇着、骗着，绝不仗势欺人，绝不走无理手和疑问手。你走哪里，他就随着你走哪里。你夹，他就跳；你追，他就跑；你断，他就弃；你围，他就削。绝对脾气随和，与世无争。然而就在这随和无争里，你领教到一股水漫金山般的自然的伟力，正像老子所说：“无为而无不为”。他似乎在哪里都无所求，但其实在哪里都有他的影子。我眼看着6个子的巨大优势如涨潮后的沙滩，越来越小。他的棋如同粘在我的棋上，我仿佛是拳击手对付柔道手，他靠在你身上，你进他退，你退他进，就是让你的拳头打不出去，但不打又显然是等死，那就只好乱打一通，在低下的效率中耗散着自己的真元。不知不觉中，一身汗珠落到手上，身后有个人伸来手帕在我额头擦了擦，一阵香水味，我觉得方寸开始乱了。

李昌镐没有大规模地杀我的龙或者破我的空什么的，只是我的空越来越小，最后只有四个角和一条边。而李昌镐则有两边和半个中腹。下到150手左右时，我盘面领先只有12目强。旁边的一位教授已经输了，后来得知是无理脱先，大龙不活。我知道聂卫平号称是前50手天下无敌，而李昌镐公认是后50手举世无双。聂卫平如果与李昌镐下到150手时只领先10目，那是凶多吉少。如今我只有这点优势，肯定完蛋了。于是不顾自己比他大十来岁，下起无理棋。先破他一个小空，又吃他一条尾巴。这厮不动声色地给我破给我吃，但却转身压扁了我最大的一条边。下到约200手，他又点进我的无忧角，造成双活。如此盘面已经是这厮略为领先，而大好河山已然分割殆尽，剩下的基本是单官了。我不愿死缠烂打，干那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无赖行径，便说声Pass，投子认输了。估计若下到最后，他会赢我10目。让6子尚且如此，5子、4子真不敢想。也许让8子，我才有点希望。

李昌镐虽貌似痴呆，但礼数不缺，示意我可以下到最后，并静等了我片刻。看我真心认输后，还向我鞠了一躬，然后专心对付最后一个敌人。这人是梨花女大的教务长、经济学教授安洪植先生，棋风跟我差不多，最后输了20多目。我又去观看其他战场，发现韩国人真有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他们在明显劣势的情况下都基本不认输，拼命捕捉着每一个几乎是万分之一的机会。有的被宰了两条龙，还在浴血奋战。而国手面无愠色，似乎习以为常。我想，韩国人其实就是靠这种精神才拼出今天的世界地位的。而中国人如老夫之流，未免有些迂腐朽惰了。

又过了近一个小时，战火才彻底熄灭。27位挑战者，折了26个。只有一个被让8子的学生赢了几目，大家鼓掌庆祝。这时的李昌镐，枯面槁目，呆呆地坐在角落里，好像《侠客行》里的石破天，一副无物无我的神态。蓦地我想，凭我的实力，让6子未必真的没有希望，只是对弈之时，他无欲无求，达到了呆若木鸡的神照境界，仿佛机器在下棋；而我一是见到“伟人”心喜，把激动带入了战斗，二是萌生贪心，隐隐地企图赢他，三是棋还没下完，就想着自己的风度之类，这就使自己的实力大打折扣。棋力不如他是当然的，但棋德上的欠修养是应该愧疚的。我本想跑回去拿相机来与李昌镐合个影，但此时忽觉这一战没有虚度，我已经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学习到了一种颇为宝贵的东西，合影之类的俗举便显得好笑了。这时组织者给国手们开饭，一大盆米饭、一大盆泡菜、一大盆大酱汤端了出来。我知道韩国古代的国王吃的也无非是这些，于是转身退场，迎着满天星斗走去。

不久，我送太太到机场，看见常昊、俞斌等中国国手在那里候机。太太说：“跟他们打招呼吗？”我万分牛气地说：“不必也，你家官人是跟李昌镐下过棋的人耶！”太太说：“德

行！”我说：“夫人有所不知。目前来韩国旅游者甚众，无非是逛逛汉城济洲岛，洗洗桑拿泡泡澡，吃点泡菜加烧烤，买点人参和皮袄。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韩国真正的国宝。你家官人来韩国两大收获，叫做：到板门店题字，与李昌镐下棋。得遇韩国两大国宝，再吃一年泡菜也心甘情愿，能不德行乎？”于是，就靠这“德行”，老夫喜滋滋地继续战斗在梨花女大，战斗在这个洋溢着泡菜味、辣酱味、香水味和烧酒味的国度里。

写于中秋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

刀下出美人

一些喜欢韩剧的中国年轻观众对韩国女影星大都产生过“惊艳”之感。哇！女人怎么可以这么漂亮耶！哇！韩国女人真让人吐血耶！其实，这些绝顶漂亮的韩国美女，跟大部分的韩国妇女简直属于两个种族。韩国的美女本不是那个样子的。如果你想知道韩国真正的美女，请看一看朝鲜的电影或歌舞，那才是真正的东亚美女。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白里透红的苹果脸，健康，质朴，热情，她们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歌颂劳动、歌颂丰收。她们带给人们的美学意境永远是“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而韩剧中那些“假欧罗巴”式的美女，用咱们东北话说，是咋“整”出来的呢？告诉你，咋整？拿刀子硬整呗！

韩国的影星歌星演艺星，哪有几个不挨刀的？韩国报刊经常披露和猜测哪些星星又去换皮挖肉抽大筋了。有的报刊说这些明星被韩国的“人工美”思潮所坑害了。至今只有一个叫李英爱的姑娘被公认是天生丽质（怪不得洒家也觉得她有几分可亲），但正因为是天生，所以姿色达不到“一流”。《蓝色生死恋》里的宋惠乔也还没发现刀痕。至于金喜善、金玟等大姐大级演员的绝色画皮，韩国人一眼就看穿了：“咱东亚女人的鼻子哪有这么尖挺、脸型哪有这么鸭蛋的？”她们脸部的线条，齐整得鬼斧神工，她们那表情拘谨、哭笑失常的脸庞，远看的确如诗如画，但近看真要怀疑里面还有没有活人的血液在流动。

今天的韩国，在眼睛上来个“拉皮”之类已经不算整容，除非是把眼睛拉成了肚脐。只有把蛤蟆鼻垫成鹅管鼻或把大饼脸削成瓜子脸，才算“整风之初”。有的韩国女人手持西洋淫娃荡妇的写真，要求医生照猫画虎，于是美神的标准就这样诞生了。相近的整容技术，相近的审美要求，相近的化妆模式，结果是大街小巷大同小异的“韩国式美女”。我看了两次韩国小姐选美大赛，满台的美女仿佛是一个母亲所生，连抛媚眼和扭胯骨的弧度都是相同的。

以拍摄“香港黑色电影”闻名的吴宇森，1997年推出一部影片《变脸》。在影片中扮演恐怖惯犯的尼古拉斯与特拉沃尔塔之间的追杀，颇为扣人心弦。电影情节要求二人彼此互换脸型，于是借助整形外科医疗组的高超绝技，两个人的脸型鬼使神差般相互替换。这一电影中的情节目前已经不再是科学幻想，随着整形外科技术的发展，今天只要你肯花钱，你就可以像装修卧室一样任意改变你的嘴脸和身段。传统的美容整形不过是割双眼皮、垫高鼻梁而已。随着激光磨皮、透镜手术、脂肪吸取术等奇技淫巧的问世，美容整形的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人体。人造骨和人造皮肤的诞生，则更使整形手术如虎添翼。

现在，通过整形手术可以拉平皱纹、扩展额头、眉上殖骨、削平颧骨和腭骨、隆唇隆胸隆阴、吸掉腹部脂肪、抽取小腿肌肉等等。其种类超过100种。韩国女人相信“外貌也是竞争力”，她们不怕一掷千金，冒着引起副作用的危险，纷纷走向整形手术台。据一份问卷调查，80%的20岁年龄段的女子说，“如果能变得好看，愿意做整形手术”。许多父母赠送给女儿的毕业礼物竟然就是整形手术。有些少妇中间甚至还盛行集资整形手术。韩国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整形国。美国报纸把有关韩国女性整形热的报导登在了头版。《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现在，韩国女性不满足于隆鼻、削颧、扩眼，为了使大腿变得漂亮，她们甚至敢做危险的小腿肌肉割取手术。”

在媒体的追踪下，有些明星干脆坦承自己是“整形美人”，整形咋的啦？你们不还照样追

俺吗？对整形手术的抵触情绪正在逐渐消失。整形医生的广告说：“与其外貌丑陋抬不起头来，宁可花点钱和时间活得愉快些，何乐而不为！”许多人被这种论调打动，于是整形之刀越舞越快。我有时在汉城的大街上看到走过来一堆“假洋妞”时，忍不住唱道：“大刀向，美人们的头上砍去。”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理性的韩国舆论认为，纵然外貌漂亮，若缺少内在的气质所赋予的自信，缺乏具有个性的艺术表演才能，是否算得上是真正的美人？但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受青睐的。在这个世界上，连爱情、友谊和民主、自由都可以造假，那么对别人老婆的酥胸玉腿是不是也不必那般当真了，反正你不就是要“消费”她们么？难道你还真的爱上了那些“带肉的骷髅”？

不漂亮的女生

我自认为是个十分敬业的教师，特别是对于学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有时出于平等意识，还有意无意照顾一下那些淘气的、学习差的和家境贫寒的等容易受到歧视的学生。无论在中学，在北大，在新加坡，还是在韩国梨花女大，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有学生由于其他原因向我提出了“抗诉”。

一天我在梨花女大上中级汉语课，让学生们准备一段对话，于是本来就乱哄哄的教室里立刻嘈杂一片。我走下讲台去巡回指导，走到最后一排的角落，一个学生趴在桌上，既不与别人商议，也不自己练习，把下巴顶在书上呆呆地出神。我问她为什么不练习？她直起身来，低着头轻声说：“反正我练习了，你也不叫我发言。”我不禁微微一惊：“谁说我不叫你发言？”

“你一共就叫了我两次。”

“你叫什么名字？”我听她的汉语很不错。

“我叫尹雪儿。第一天点名的时候，你说过我的名字是好听的名字。可是你以后不叫我。”

“我没有叫你吗？我为什么不叫你呢？”我心里一点印象也没有，对这事感到很奇怪。

“我知道，”她好像轻轻叹了口气，“因为我长得不漂亮，老师们都不愿意叫我，小的时候就不叫我，从来不叫我。可是，你也不叫我。你和他们一样。”

她的声音很小，加上韩国式的没有起伏的语调，一米之外根本就听不见。可是这话却给了我猛烈的撞击。我连忙解释道：“不要胡说，谁说你长得不漂亮？我会叫你的。”

但是她并不看我，只是低着头道：“就是的，我自己知道。”

我注意看了她一下，是不大漂亮，小鼻子小眼小脑门，但也并不丑，是个很“普通型”的亚洲姑娘。我凭良心说，我叫学生发言的时候，如果点名，更多注意的是那些奇怪的名字，如果不点名，则注意的是谁有愿意发言的表情，或者谁在下面玩闹。根本不会从漂亮不漂亮的角度去考虑。可是经她这么一番指责，习惯于事事反省的我，不禁扪心自问：莫非我的潜意识里真的考虑了漂亮的因素？再细思一下，这班里的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似乎的确发言次数多一些，可是那是因为他们坐在前边，整天仰着头对我行注目礼，发言热情非常高嘛。再说有些不爱发言的学生就是故意坐在后面，暗示老师少叫她们。你却给我扣了这么大一个帽子。我想以后故意多叫她也不好，那不等于承认了她对我的指责吗？于是以后我注意每次上课都叫她至少一次，但是总是与其他人混合在一起，不要她做特别难或特别简单的练习，总之是尽量轻描淡写。可是每次叫她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起那天的事，我也能够听出她的发言很努力，好像另外有一个声音在跟我对话似的。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成绩是中上等，我多给了她3分，感谢她

给我上了一课。

(梨花女大是韩国“美人窝”，不漂亮的女生在此确实难免有一点心理压力。)

坐飞机上课的学生

中国人见多识广，对于优越感颇强的韩国人往往不以为然。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必须承认的，那就是韩国对于教育的重视要明显高于中国。这不仅表现在政府的措施上，更体现在普通人的意识里。我今年被北京大学派到汉城的梨花女子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有一门研究生的课程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课上有一名学生，从一开始就让我觉得有点与众不同。她长得娇小玲珑，眉目秀气而又灵动，体态清瘦而有风韵。她常常与别的学生一样欢声笑语，甚至还更多几分活泼，但是她的一举一动中都显露出一种成熟的优雅，一种自然的细腻，和一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教养。所以虽然她的肌肤比别人更年轻，而我却断定，她一定比别的学生要年长。

我的猜想没有错。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的家不在汉城，她的家在光州，她是每星期坐飞机来上课的。原来，她已经在梨花女大本科毕业许多年了。她用她学到的中文，在社会上做了许多工作。现在，她和姐姐一起，在光州开办了一所中文学院，她自己又当院长，又当教师，管理和教学一把抓。在繁重的工作中，她越来越感到需要充实知识，需要提高层次。于是，她又一次踏进母校的大门，为自己的未来“充电”。

在中国，如今也有不少事业有成者重返校园。但那多数是“镀金”。有的是为了升迁，有的是闲得无聊，有的是领导统一布置，单位统一出钱。而像这样完全出于自己的觉悟，完全为了求知而走进校园“重吃二遍苦，再遭二碴罪”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实在是少而又少的。何况她又是完全掏自己的腰包，每星期一次“从天而降”呢？

“你为什么不坐火车或者开车来呢？”我这样问她。

“坐车需要4个多小时，飞机只要1个小时。”她认真地答道。“我把课程都集中安排在这两天，这半个星期专心学习，回去半个星期专心工作。”

“那你岂不是太累了？什么时候休息呢？”

“我过一阵去加拿大两个星期，专心休息。”专心学习，专心工作，专心休息。这，就是她显得成熟而优雅的秘密。我本来想问她如何保持年轻的，但既然了解了她的总体生活态度，那些小事不问也可想而知了，无非是“专心保养”啦。

不久前，我和其他一批老师，坐了4个小时的火车，到光州参加韩国中文学界的一个国际学术大会。一下火车，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她就请我们去著名的“东山饭店”吃烤肉。那个饭店除了肉味鲜美之外，另有一项招徕顾客的绝活：年轻的仆役为客人拌饭时，上下飞舞着钢匙，把不锈钢的饭碗敲得叮咚乱响，吓得姑娘们一个个“掩耳听铃”。作为光州当地人的她，也兴奋得满面春风。我说：“如果我在北大下岗了，就到你的学院工作吧，你只要每星期请我来这里吃烤肉就行了。”她星眸闪动地连说：“没问题，行，行。”

参观光州5.18墓地的時候，我问她那一年多大。她说小学6年级。她的眼睛里一下子没有了活泼，没有了灵动。我没有再多问。我心里想，在当年那隆隆的坦克碾过的大街上，在曾经血肉横飞的广场上，如今成长起这样一位成熟的女性，她每周坐着飞机去学习中国文学。她从我这里学习鲁迅、老舍、沈从文，从别的老师那里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然而我们应该从她那里学习一点什么呢？

从光州回到汉城，我们坐高速巴士，仍然用了4个多小时。在车上，我对朋友说，世界各国都有坐飞机去吃饭的，有坐飞机去赌博的，有坐飞机去嫖娼的，但是对于教育，有些人不要说

飞机，连坐车都拿不出钱或者不肯拿钱。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代课老师要去找学生，不就连一张车票也买不起吗？

坐飞机去上课，不是一种派头，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走路也能搞好教育。

这位坐飞机来上课的学生，名字叫吕承娟。她用一副娟秀的身躯，承担起了一种值得仰视的精神。

(为纪念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五七指示”，写于5月7日凌晨。发表于中韩多家报刊网站。)